



第八期目錄

- 對外國記者演詞(特載)
歐戰與中國之前途(特載)
國是與黨見(轉載)
怎樣利用歐戰
意日與歐戰
「九一八」八週年
日本總動員法第十一條反證近衛聲明的真實性
日本的弱點
上海民食問題(下)
日蘇停戰協定與中國
黃色人種的警鐘
蘇聯人口問題之危機(續)
予欲無言集
書申報某日社評後

汪精衛
汪精衛
編輯室
鎮南
劉鏐譯
仲平
王時傑
木軍譯
重耳
楊乃匡
沈勇
西苓譯
葉紀懷
余文周

特載 對外國記者演詞

汪精衛

——九月七日在上海寓所招待席上講——

諸位先生：今日光臨，至為愉快！

鄙人於去年十二月間，鑑於重慶中央黨部國民政府為共產黨所劫持；對於時局，明知和平機會已經到來，仍不肯依據去年四月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所示方針，謀抗戰之結束，和平之實現；鄙人再三爭執無效；仰體民意及順從多數同志之請求，離開重慶，俾鄙人的主張得以公開發表。自是以後，鄙人暫居河內，並赴東京，回國以後，周歷淪陷各地，北平南京廣州皆會到過。其所以赴東京，在探明近衛聲明及鄙人豎電主張能否實現；其所以到淪陷各地，在謀重慶方面民衆及同志之意見與淪陷各地民衆及同志之意見之合一。其工作之第一步，在如何恢復中國國民黨之本來面目及自由獨立之行動；第二步，在如何收拾時局，化戰爭為和平，使中國終於得救也。今者，中國國民黨第六屆全國代表大會已經開會，以一致之議決，發表宣言及各種決議案。鄙人之第一步工作已經成功，故藉此機會與各位先生相見。

在與各位先生相見以前，鄙人曾接到各位先生詢問之件凡數十條，有可以綜括答覆者，有可以逐一答覆者，有未能即刻答覆者；今分別敘述如左：

各位先生詢問中有云：鄙人係已被開除之黨員，以何權力仍用黨之名義活動？此種詢問，極為率直，鄙人願意率直答覆。其一，中國國民黨最高機關係全國代表大會，如有違犯大會者，即為違法；鄙人之和平建議係依據大會宣言，當時重慶中央黨部國民政府不依據大會宣言，違法之責在重慶中央黨部國民政府，不在鄙人也。其二，中國國民黨係革命黨，平時辦事，固當沿用普通手續，如果有特別大故，則不得已而用特別手段，縱有些不合手續，亦為革命黨精神所容許。以前如此之例甚多：十六年間，中央黨部國民政府在武漢，蔣介石在南京，以武漢為共產黨所劫持，宣布脫離，另行組織，從事清黨；當時武漢中央黨部予蔣介石以開除黨籍處分，國民政府明令通緝；然其後武漢中央黨部國民政府發覺共產黨陰謀，遂繼續清黨，而與南京合作。十八年間，鄙人以蔣介石在南京個人獨裁，激起內亂，動搖國本，倡言反對；當時南京中央黨部國民政府對於鄙人，予以開除黨籍及通緝處分；鄙人先後在北平組織擴大會議，在廣州組織非常會議，與之對抗；及二十年九月十八日事起，蔣介石派人至廣州，謀與鄙人等合作，遂由上海會議解決糾紛，復歸統一，而鄙人遂入南京長行政院。以上兩例最為顯著。最近第六屆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及各種議決案，對於此點已加以明白之闡述矣。

如今一述鄙人前赴東京之經過：去歲四月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閉會之後，蔣介石曾命外交部亞洲司長高宗武辭去本職，另昇以重要任務，使駐香港，與日本接洽和議；外間所傳高宗武個人自由行動，絕非事實也。高宗武接洽和議，屢有接近之機會，而蔣介石因其個人位置問題屢生反覆，以致和議久久無成。鄙人之赴東京，並非另有線索，不過使高宗武所已接洽者不致中斷而已；而赴東京與日本當局接洽之結果，使鄙人確信近衛聲明及鄙人建議可以實現。

如今再一述鄙人周歷淪陷各地之經過：當鄙人前赴各該地時，外間傳以為鄙人將在各該地組織政權，及鄙人離去各該地時，則以為鄙人失敗而去；此非重慶之惡意宣傳即誤會耳。其實鄙人所抱之目的，及所任之工作，係與各該地之同志及黨派不同而救國志趣相同之人士，開誠布公，共謀收拾時局之辦法，以期共負收拾時局之責任；並與駐在各該地之日軍當局為誠意之協商，俾收拾時局之具體辦法有實現之可能也。

現在工作之第一步，即所謂恢復中國國民黨之本來面目及自由獨立之行動，已告成功；其第二步，即所謂謀收拾時局具體辦法之實現，亦將著手矣；然在目前尚未到達組織中央政府之階段。故諸位先生有詢問中央政府成立以後之事項，如幣制關稅以及其他財政問題等等，恕未能奉答。

其可以奉答者：諸位先生關心撤兵問題，誠然撤兵為和平之結果。今者重慶政府尚在高唱抗戰，撤兵固無從說起；然使重慶政府歸於消滅，則全國以內和平統一，撤兵必可做到。至於諸位先生所慮撤兵之後，中國方面有無軍力可以接收各地，此則鄙人可以奉答：其一，中國軍隊有奉行第六屆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為和平反共建國之表示者，其兵力可以保存，即有接收各地之能力；其二，各地民衆苦於游擊隊之滋擾，已相與團結以武力自衛，此等民衆皆從根本上贊成和平反共建國之主張，用其武力即可保持地方之安寧秩序。

關於外交方針，第六屆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已經明白提示，中國當與日本協力以維持東亞之和平，當與各國增進友誼以維持世界之和平，各國在中國之合法權益必當尊重；此不但在外交方面看來是如此，在經濟合作方面看來亦如此也。諸位先生提及將來中央政府之承認問題，依鄙人意見，此問題無從發生，蓋將來之中央政府即現在之國民政府，不過從國民政府中除去共產黨人及為共產黨支持之人，而易以和平反共建國之分子；詳言之，人事更迭政策變換而已，其國內法律上之地位與國際上之地位依然如故也。抑鄙人尚有言者：即使各國中有倡為不承認將來新中央政府之說者，鄙人亦認為無關輕重。吾人於辛亥之役，革去滿洲帝國之命，各國非至二年以後始承認中華民國乎？吾人又於十四年間建立國民政府於廣州，其後出師北伐，革去北洋軍閥之命，各國非至十七年以後始承認國民政府乎？此於吾人何傷者！反之，西班牙共和國政府各國承認之，及其相與亡命於法蘭西，則亦非承認所能挽而止之也。

要之，吾人目的在救中國於危亡，無損於各國，與日本協力共保東亞，亦無損於各國。盼各國政府及賢達人士相與明瞭吾人目的而贊助之，則幸甚矣。

載特

歐戰與中國之前途

汪精衛

數年以來，歐洲各國，準備戰爭與避免戰爭兩個錘子，總是動搖不定。到了最近，戰爭終於不能避免而爆發起來了。中國人民正受著戰禍，對於同受戰禍的歐洲各國人民，只有抱著十二分同情，而望其戰禍之早熄。

決定這回戰爭的最近最直接的原因，自然是德蘇協定。論起德蘇協定：在德國呢，對於反共軸心，未免背棄信義之嫌；但數月以來，英法蘇軍事同盟，大吹大擂，使德國觸目驚心，要打破包圍形勢，免得再蹈上次大戰的覆轍，所以出於這樣挺而走險的行爲，也還有些可以自解。在蘇聯呢，對於民主集團，也不免背棄信義之嫌；好在民主集團不過是這麼一個名詞，蘇聯其實也不是什麼民主。只是蘇聯這一次，如果事前不大吹大擂，在莫斯科開什麼英法蘇軍事同盟會議，則德國也不至走這險著；如果英法蘇軍事同盟會議不成功，只要不締結什麼德蘇協定，德國也不至於走這險著；如此則歐戰仍然不致於爆發。蘇聯爲什麼如此做法？分明是要使歐戰爆發，這是毫無疑義的。歐戰爆發之後，依據上次大戰經驗，戰敗的國家固然吃虧，戰勝的國家也沒便宜，惟有最後出來的國家纔操有決定一切命運之權，這是誰也羨慕的事。

只是這次與上次大戰不同。上次大戰，最後出來的，只有一個美國；而今呢，除了蘇聯之外，還有美國，還有日本；此其一。何況義大利是一個反共的國家，如果蘇聯最後出來決定歐洲命運，義大利何能坐視？此其二。英法這次被賣，已很夠受了，難道眼睜睜的上當？此其三。德國也是一個反共的國家，走這險著，只是萬不得已，難道不知爲備？此其四。有此四者，則前途變化如何，此時尙難逆料。

各國都是爲自己打算。蘇聯之所以出此，自然也是爲自己打算；是非曲直，我不欲加以批評。我所注意的是各國如何對付共產黨。

共產黨人是不知有自己國家，不肯爲自己國家打算的。如今英法對德作戰，英法國內的共產黨人怎樣，德國內的共產黨人怎樣，英法德總不能不關心罷！拿我個人的經驗來說，自從抗戰以來，最使我痛苦的一件事，是有共產黨人夾雜在

國是與黨見

編輯室

——轉載九月十三日中華日報社評——

我們有一個中心主張，用最簡明的語句來說，就是「戰則全面戰，和則全面和」。

蘆溝橋事變起來之後，我們認爲中國的抗戰，無可避免；我們便一致主張抗戰，而抗戰必須盡全國最大的力量。抗戰兩年，國際的援助不可靠，軍事的失敗不可救，經濟財政的危機不可挽；我們便堅決主張講和，而講和必須求全國一致的瞭解與贊助。

我們反對以無可再戰之戰而亡國覆種，我們便冒危險、排衆議而主和；我們一樣反對以支離滅裂的和而講和。換句話說，如果和平足以陷中國於支離，亡中國於破碎，我們是痛心的；不獨痛心，而且必加糾正。

因之，無論重慶方面怎樣的誣蔑，說我們東不成西不就；也無論淪陷區的民衆怎樣的期待，望我們速執政、早成功；我們仍然一貫，仍然不動；從事於喚起全國民衆瞭解，促成各方人士合作的和平運動。我們希望做到「和則全面和」的地步。

裏頭。他們的抗戰是為第三國際而抗戰，不是為中國而抗戰；他們只知有第三國際，不知有中國；只知為第三國際打算，不知為中國打算；一切言論，一切行事，都是由此出發的。因此之故，我和他們無論怎樣不能在一塊。我之離開重慶，十之八九是為共產黨人夾雜在裏頭，弄得抗戰的空氣變了質了。這樣抗戰下去，敗則中國實受其禍，成則受其福者不是中國；這樣越抗戰下去，中國亡得越快。這是我離開重慶的原因。我願意英法德諸國人民知道這滋味不是好嘗的！自從歐戰消息到來之後，一般人未嘗不想著，日本大可趁英法在西方打仗的時候，毫不費力的將英法在東方的殖民地拿了過來，然而日本却對歐戰宣告中立；這是什麼緣故呢？日本知道如此做法，英法必然狼狽，其結果促成德的勝利。也就是促成蘇的勝利，不難一轉瞬間使整個歐洲成為赤化。所以日本寧可宣告中立，不使英法東西不遑兼顧。日本看到這一層，英法定然也看到這一層，德也未嘗不看到這一層。所以這一場戰，或者會把英法與日本聯合起來；義本來反對共產的，也可聯合起來；美素來反對共產的，即不聯合起來，也必然不會加以反對。其結果德則廢然知返，蘇則落一場空，前途變化如何，縱未可知，但有這可能的。

所以中國在此時候，唯一方法，是與日本從速恢復和平。這在日本有其必要，而在中國尤有其必要。因為日本在此時候，自然想些從容的時間，保持著而且擴充著優越的國力，來應付世界無窮之變；而中國在此時候，也只有早日結束戰爭，早日得從事於恢復，以完成建國的工作，纔不致在世界的漩渦中被捲了進去。這是極平常而又極明顯的道理。有人以為中國在此時候，應該對日本抗戰到底，方纔可以得到最後勝利。這種說法，在從前是根據著一種茫昧的揣測，來下鹵莽的判斷；以為英法美蘇在一起，日德義在一起，前者是民主集團，反侵略陣線，後者是法西斯集團，侵略陣線；交戰起來，前者必勝，後者必敗；中國站在前者一方面，所以最後勝利必然可得。可是這種說法在今日已不值一駁了。集團已不成其為集團，陣線亦已不成其為陣線了。誰勝誰敗，縱未可知；而勝敗的結果其及於中國之影響，必然不是那麼簡單了。然則抗戰到底，最後勝利，其論據安在？如果說只是中國和日本抗戰到底，日本也必不得了。須知道，日本也許不得了，而中國必然更不得了；這又有什麼好處呢？我向來說，如果和平有了希望，如果和平的條件無害於中國之獨立自由，則和平早一日是一日。如今我還這樣說，而且更堅決更肯定的這樣說：中國在此時候，只有和平，纔是出路。

我們的心目中，只有國是，沒有黨見。

在積弱的中國，如不是集合各民各階級的力量來和，則和必不能達到軍事復員、社會安定、國家復興、民族繁榮的目的。我們的和平運動，本於這種精神與宗旨而邁進。我們不獨沒有黨見，抑且沒有急功。

彼以黨爭與內戰的心腸來作外交政策的權衡者，必陷國家民族於支離破碎的境地，萬劫不復。彼以黨爭與內戰的心腸而作戰，戰不過用以剷除異己，培植私軍。彼以黨政與內戰的心腸而言和，和不過用以操縱把持，排擠傾軋。戰而無誠意，則戰足以亡國。和而無誠意，則和也是以亡國。我們反對這樣的戰，也要糾正這樣的和。

在外無救援內有共禍的今日，敗戰之殘餘，滅亡之前夕，祇要有理性，祇要有誠心，必當披瀝衷腸，共謀挽救。因之，我們呼籲國內有國是而無黨見者一體合作，相期無違。同時，我們反對有黨見而無國是者，又要把中國陷於戰無可戰而和亦無可和的支離破碎的深淵。

怎樣利用歐戰

鎮南

重慶方面對於任何國際變化總是認為與中國有利的，不獨對歐戰爲然。在重慶方面發表歐戰與中國怎樣怎樣有利之後，我們也曾針對現實相反的說明是惟其怎樣怎樣有害了。如果重慶方面能提出一百個有利的理由來，我們更可以提出一千個一萬個有害的理由。其實，歐戰與中國之有利或有害，原不在歐戰本身，而在中國對於歐戰所取的態度，在這個態度上才得知其利害得失。和歐戰未發生時一樣，中國的利害也只有取決於中國所取的態度。重慶方面過去也曾說過歐洲和平與中國是有利的，說是歐洲和平一有保障，則英法各國便將共同致力於遠東，幫助中國制裁日本了（這就是重慶所最稱道的國際調停），結果是一場空相思。現在又說戰爭與中國有利，說是日本必加入德義的侵略陣線，民治陣線必能打倒侵略陣線，從而中國必能打倒日本。種種如意算盤，打得頭頭是道。可是現在有沒有絲毫影響呢？

意日與歐戰

H. G. W. Woodhead 著
劉 鏗 譯

—Oriental Affairs—

一 意大利與歐戰

近幾個禮拜以來，大家都確信：意大利是會參加歐戰的——參加德國方面。至於對柏林逃避責任這一點，意大利怎樣去辯護，還不清楚。不過現在，世人有一個普遍的感覺，就是在危難當前的時候，柏林羅馬軸心，顯然是非常脆弱。這一點，已由許多接連的事實，加以証明了。

假如這次戰事，能一直打到底，而意國始終不出來站在德國方面加以干涉，那末意大利當然是出賣了他的同盟國了。不過這種說法，恐怕很難成立。因爲破壞軸心的，不是墨索里尼，而是希特勒。這一點，已由墨氏九月五號的申明說得很清楚了。

軸心同盟，被認爲是一種防衛性質的協定。若謂墨氏情願把意大利束縛在柏林的尾巴上，以至爲着希特勒的幻想使意國捲入世界大戰，並且最後還演出一種殘酷的侵略的行爲，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墨氏認爲目下的衝突，是由於殘酷的侵略的行爲而引起的，假如你把墨氏所說的話加以咀嚼，便可知道。

德國想以武力來解決但澤問題前的一個禮拜，曾將此意通知意國；其時正值墨氏加倍努力，促成以談判的方式作和平的解決。由於這一點，墨氏一覺得：他對法的了解，已經被德方破壞，並覺得意大利可不復受其諾言的約束，所以暫時保持中立。

這當然不能說，意大利定然永久保持中立，或者說意大利絕沒有站在德方加入作戰的可能性；但是確已表示意大利不願意在現在加入戰爭來支持德國的征服計劃。她將走那條由他自身利益所決定的道路。現在問題就是：意

天下決沒有不思自助惟求人助可以成功的事，何況在惟自身利益是圖的今日？在重慶的一味依賴心理之下，不知斷送了多少次死裏求生的機會了。現在，正因為歐戰之發生，中國的處境更其危殆，如果再不自助，一旦歐戰的狂濤波及遠東，是惟有把中國沖擊得支離瓦解而已。我們更看出，在歐戰的火花尚未飛濺到太平洋上的時候，中國倘能利用時機，利用國際間的反撥形勢，不僅可以避免歐戰狂瀾的沖擊，亦可使中日問題造成更有利的解決。這是我們不得不大聲急呼的。

我們首先要承認歐戰對於中國的無可諱言的弊害。第一，因為英法之參戰，抗戰政權失去了最大的後台，精神上與物質上的支持是完全落空了。若說還可求之於美蘇兩國：則在美國，既因專心致意於歐戰之發展，又因日本的態度尚未完全確定，她決不會在此進退得失之際貿然地爲了英國而肩遠東之木梢，以與日本爲難；至於蘇俄，無論其對於日本有無繼續戰協定進一步調整國交之意，即說要戰，也是先參加歐洲而後才輪到遠東，可不是她現在已把軍隊開入波蘭了嗎？所以，現在的中

國的利益在什麼地方、

意大利暫時的中立，無疑的是對她有利的。意國大部份是依靠輸入來維持的，假若他成了交戰國，那海上一部份的輸入，立被阻斷。當地中海中的英商輪船不能航行的時候，意國自己的商船，雖則其數目和噸位不足以適應其自身的需要，仍可以獨佔地中海的運輸。

意大利商輪，若運輸貨品接濟德國，當然會和英法發生磨擦。但是意國，見到必須靠其自己所有船隻，運輸物品以應自己需要，他也許會覺得，避免和英法對德的封鎖作對，與其自身，也沒有不利的地方。

衆信羅馬朝廷和教廷，尤其自德蘇訂約以後，是反對與德國共同作戰的。並且意國若幫助德國作戰，在意大利廣大區域之內，有發生廣泛叛變的危險。發生革命的猜測，也許證明是不錯的。

再者，意大利若參加德國統治歐洲的企圖，能夠獲得物質上或精神上的什麼利益呢？這却也很難說。就連最近評擊柏林破壞意國對德了解的墨索里尼，恐怕也不再存什麼幻想，還去信任希特勒的保證吧。德國勝利的結果，恐怕——同時也是事實上不可避免的——就是條頓族完全奴役意大利。

因此，意大利在中立必得放棄的時候，他必然根據其自身的利益，去決定走什麼路線，參加那一方面。意大利索取中立的代價必高；若要他加入英法方面，其代價必更高。關於這個爭點，也許大家意見是很紛歧的。

倫敦巴黎有一派思想，認爲意大利是軸心中易於攻擊的份子。這派思想，與德國專家的觀點差不多，認爲意國的武力不但不能被認作是助力，而且是一個負累。那派思想，甚至認爲，若意大利立即助德作戰，對於英法反而有利。

另一方面，有人覺得：縱然英法在意大利能獲得迅速的勝利，結果使該國陷於混亂狀態，對於民主國未見得真正有利。

雖然墨索里尼履行諾言的記錄上，其污點，到現在還不會洗滌乾淨，但是一年以來英法對於他的仇恨，並沒對希特勒的仇恨那樣深。

一個強大而有秩序的意大利，被認爲是穩定歐洲的條件。在政治的實際

國已處於無倚無靠的孤立境域；這種境域決不是乾枯脆弱的現時中國所能支持的。

第二，即說英法雖在對德參戰之際也還同情中國，美蘇兩國又是完全幫助中國；但是，照目前形勢而言，如果波蘭在華沙陷落之後仍不對德言和，則第二步的大戰勢必廣大的展開，那時，蘇俄固然已捲入戰渦，美國亦不能置身事外，全世界是混戰起來了。可是，蘇俄是加入德義方面，美國是加入英法方面，中國將往何處呢？恐怕除了被這兩方面擠死而外，別無去路可言。

第三，再就日本來說：如果遠東局面長此僵持，日本因無法脫離國際關係的糾纏，結果也必被捲入世界大戰的旋渦。日本參加世界大戰固然與自身不利，然而與中國是更其不利。假使日本參加英法方面，則英美法幾國為酬答日本起見，必然在遠東來一個慕尼黑會議，結果中國將蹈捷克的覆轍。假使日本參加德蘇方面，則在蘇日關係好轉之下，蘇俄不會再幫助中國，至少以共產黨為靈魂的重慶政權必趨崩潰，中日之間也就不能獲得公允的和平了。從上述三個大危機中，可以認出一個

上，使軸心發生裂痕，也許值得付相當的代價（不是極大的代價）。羅斯福總統會直接向意王呼籲，請他斡旋和平。羅氏此舉，似乎已被事實證明，並沒有弄錯。並且英首相也公開證明：在但澤問題發展到最後一個階段的時候，墨氏的力量都是用來斡旋和平，而沒有偏向戰爭。意大利人民，聽說至少暫時不致捲入希特勒的侵略戰爭，因而覺得放心了。在放了心以後，要想鼓起他們對英法作戰的熱誠，恐怕比一個禮拜之前，要困難得多呢。

二 日本與歐戰

在這歐洲大戰爆發的時候，日本人對他們那位反其伙伴所加在他們身上的那種粗暴的待遇，仍舊是憤憤於心的。新內閣剛剛就職，對歐洲和遠東，都還沒有時間來議定一個確定的政策。意大利避免捲入戰爭旋渦，在東京看來，似乎減少了德國最後勝利的可能性，並且還替平沼內閣拒絕更換反其協定為軍事同盟之舉，作了一個辯證。

當然，很顯然的，英國在歐洲有事了，在遠東恐怕不能採取強硬的政策，日本也許會利用這一點，去謀她自身的利益。可是在遠東局勢之中，還有一個未定的因素，那就是美國。因為歐洲正忙於作戰，太平洋上的均勢暫時必有變化。假如要對日本在華的要求作有效的抵抗，這件事的責任，大部份落在美國的肩上，而且一天天在增加着。在危急時候，美國的政策一向是不易捉摸的；在現在歐洲開戰的時候，更令人難以逆料了。假如孤立派得勢的話，美國恐怕要把歐亞兩洲所有利益完全放棄，並且對於東西兩半球正在發生的那些震撼世界的大事，作毫不關心的壁上觀。

在目前，日本似乎已經決定了一種完全獨立的政策，避免和歐美發生糾葛，而專心致意來解決中國事件。她希望歐美的注意，完全集中在歐洲的戰事方面，因而不來抵抗或防礙他在中國建立東亞新秩序的政策。因此我們可以預料日本在華將對英法作進一步的壓迫。可是這種壓迫不能超過某種限度，就是不能危害美國的利益，也不能達到在日本人估計之下的美國要起而反抗的那種程度。

日本曾向英法「建議」，請他們為顧全中立國的利益起見，撤退在華的海

共通的焦點：就是，中國若不與歐戰絕緣，結果是只有死路。要與歐戰絕緣，就非實現中日和平不可。因為中日一日不和平，在中國便一日不能擺脫歐美的牽制，結果中國自己先捲入歐戰的旋渦，終被擠死。在日本，中日一日不和平，便一日不能固定其中立地位，結果日本被捲入歐戰旋渦，中國也跟着捲入，還是被她們擠死。

但是在另外一面，中國如果對日言和，則日本鑒於自身危機之深重，必能誠意接受，其條件也許較之過去還要寬大。英美法蘇正有事於歐洲，決不致出而干涉，何況中國並不歧視任何一國的正當權益，她們也落得做個人情。中日和平實現之後，中國便可不必顧慮任何國家的牽制，不致捲入世界戰爭的旋渦，便可從容於國內的整理與建設。也許世界大戰告終的時候，中國的狀況已今非昔比。就日本本身以至整個遠東局勢而言，也只有中日和平才能獲得安定，才能隔絕歐戰的風波。

我們認為：中國若向抗戰之路前進，則歐戰對於中國有百弊無一利；中國若向和平之路前進，則歐戰正是中國的大好機會，利用此機會，中國便有復興的希望。

軍。像這類不合英法口味的「建議」或要求，預料將來有隨時被提出的可能。中國方面曾公開表示過，怕英法兩國：縱不能實際同意和日本合作，亦將對日本的一切在華行動予以寬恕。

自然，日本很歡迎這個天賜的機會，這對歐洲兩大強國，施行壓力，這兩國是她實現在華計劃的障礙。我們須得認清，這兩國要保護其在華合法的利益，處境亦頗困難。假如日本採用武力，那沒有別的辦法，祇好暫時犧牲兩國的在華利益，就是她兩國的人民，因不能撤退至香港、新加坡或帝國其他部份而遭受損失，也只得忍受。英法也許會在香港、馬來亞和印度支那，來保護他們在遠東的利益。

對日本將會提出的許多「建議」或要求，英法恐都不能接受，而英法對於日本的回答，必然是：「我們做不到」。蓋因彼等在華地位不但建築在其自身的基礎上面，亦且建築在多方面的條約上面，而這些條約他們自己沒有權力去片而廢止的。正因有這個因素，日本的計劃或許受到某些重要的限制。東京將來一定會知道，要威逼美國接受那些足以影響其自身以及英法利益的要求，是不可能的。假如有人想像，以為英國或法國政府會參加一種威逼美國的企圖，那簡直太不合理，不值得一笑的事。

目下的問題是究竟美國在維護共同的以及其自身的利益方面，願意獨當一面的做到什麼程度。假如英法撤退華北和上海的駐軍，美國願意在這兩個區域以內，負起更大的責任嗎？假如美國願意，日本恐怕也不會把事情逼到那種田地；假如不願意，在我們推測，歐美在華的利益，將迅速消滅。

日本想在歐洲發生衝突的時候，來排除外人利益的這種企圖，一定是很強的。不過東京也許見到這種政策會完全摧毀其自身的經濟地位，故而這種企圖，也許會被抵消了一大部份。其實日本若能保持中立，同時和西方民主國維持友誼的或至少正常的關係，她可以享受許多商業上的利益。現在大規模的戰事正在開始，製造品和其他商品的需要，必然增加；再則德國受了封鎖，其市場將與外界隔絕，所以日本祇有向英法美去求商業復活的機會。關閉其對外貿易的市場，定然不能改進其地位。在目下危急之秋，英國絕不會鼓勵和他敵對的或不友好的國家通商。這句話說來，並不言過其實的啊。

「九一八」八週年

仲平

七、八、九，接連着三個觸目驚心的月份。二週年的「七七」和「八一三」剛才過去，現在又來「九一八」的八週年了。每個紀念日子各有其特殊的意義。我們在紀念「八一三」二週年的一文中，曾經把「八一三」與「七七」的不同之點指摘出來。現在所想到的，「九一八」及「一二八」的兩次事變，與「七七」及「八一三」的兩次事變，更有其不同的意義。惜乎這些意義均未能為當局所覺知。

「七七」事變以前，政府當局曾說：「和平未到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這兩句話的本意，是說：「有一分和平的希望，總是希望和平；能減少一分犧牲，總是避免犧牲」；意至明顯。根據此種主張，我們覺得「九一八」的不抵抗和「七七」的抵抗同樣是錯誤的，錯誤在當局者未能辨別其特殊的意義。

「九一八」當時，日本的對華政策完全操諸法西軍閥之手，行政首相因格於「各都政務直接對天皇負責」的憲章，根本不能積極干涉軍部的行動，反而要替它在國體上作違心的支持。這種政治依附於軍事的反常現象，在史汀生的「遠東之危機」一書中說得狼狽盡。日本軍閥獨斷獨行的進兵東北，是百分之百的侵略行爲。對蠻不講理的侵略者有和平可言嗎？何況未及廿四小時已佔領滿南全線！如果否認滿洲是中國的領土，則所謂「關頭」，當時已不僅到了「最後」，全國人民都要求抵抗，何故政府不加抵抗呢？這是絕大的錯誤。因

爲有此誤謬，助長了日本軍閥蔑視中國的暴戾之氣，由滿洲而華北，步步進迫，終於演成「七七」事變。

當事者也許會說：當時雖想抵抗，只因準備尚未成熟，未便輕率從事。那末「七七」時節是不是已經準備成熟了呢？據多方面的調查，「七七」事變前，中央根本未打算抵抗，所以各地防務並未積極佈置。這話不是假的，「八一三」戰事發生後，一面在淞滬打起來，一方面在後方瀏河及青陽港一帶布置所謂第一第二狂吹的比得上馬奇諾的防線；這些臨時建設的防線，由其簡陋脆弱，所以不經一打便以破竹之勢而被摧毀了。「七七」時，並未準備，亦可抵抗；「九一八」時，何故不可抵抗？

「九一八」與「七七」的結果雖不同，而其錯誤則一。欲以「九一八」與「七七」的中國及日本的現狀相較，則更發現一個更大的錯誤。這個錯誤的前提是：「九一八」應該抵抗而「七七」可以不必抵抗。何以言之？

就日本方面來講：如上所述，「九一八」時，日本軍部的行動是百分之百獨斷獨行的，對付這種蠻不講理的勢力，除了抵抗之外，別無他法；但是中國並未抵抗。在關東軍既未經抵抗佔領了東北四省並造成所謂滿洲國之後，因為經濟投資不能獲得他的國內資本家的贊助，致使軍部方面有騎虎難下之感，加以犬養毅之被刺，及「二二六」政變之荒唐，更引起國內的不滿；軍部勢焰，因之稍戢；相反內，政治派的權

力却相當增強起來。廣田內閣是「二二六」改變後十日產生的，他執政未久，便揭出所謂「三原則」，欲以政治方式解決中日爭端。這是在日方面對華侵略趨勢已見減退的明證。廣田之後，繼以林銑，林銑雖屬軍部系統，但非極端派人物；故政策並未因之而有何等變更。洎後近衛上台，更顯示日本將以調和政策處理中日爭端。在調和政策之下，和平決非無望；可是在近衛上台剛巧一月之後，中國是抵抗起來了。

就中國本身而言：在「九一八」時，中央是國民黨的中央，是正常的中央；抵抗與不抵抗，總還有正常意志可以表現，總還有自主之計可言；其因抵抗或不抵抗而招致之進遠得失，總還有後一步的自主的補救方法可想；縱然失敗，其危險還小。但在「七七」，既有共產黨挾持操縱於前，又有反蔣派伺機待動於後，此時的政局，險惡萬分，一有差錯，勢必一敗塗地不可收拾。當此之時，對日既未至完全失望之絕境（假是外交措置得宜，決不至完全失望），對內則險象環生，當局者應如何審慎周詳，為整個國家民族的實在利害打算，勿輕率起釁。可是當局者却是爲了個人權位，反而不惜投入反對派的懷抱，竟然抵抗起來！

我們找不出「九一八」不必抵抗和「七七」必須抵抗的理由，更找不出「七七」較之「九一八」更不容易採取和平政策的理由。我們所看到的只有錯誤。

假使「九一八」是抵抗的，至少有下面三個結果可以推斷出來：

一、日本軍閥以爲中國是一蹴即可屈膝的，如果中國一來便予以堅決抵抗，必能擊破其蔑視心理，不致使其把戰焰增高。

二、關外天險頗多，中國若能和這兩年來的抵抗一樣，憑險扼守，當不致像江南北一帶節節敗退，戰爭範圍亦不致擴大。

三、由於上述兩種情形，加上國際的援助，必能在東北一隅支持較久的戰局。在這支持中，必能削弱日本軍閥的威勢，增強其政治階級的權能；同時應用外交方法與之談判，也許不必有近衛聲明那種國策，中日之間的爭端早已解決，東亞和平早已實現，不會再有這一次的舉國塗炭了。

因爲「九一八」一氣之餒，造成今日的空前慘劇，當時的中央政府，應該負這個責任。

即在今日，當局尚尙存有絲毫的愛國之心，也還有補救之計。例如說：「和平未到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的本意是「有一分和平的希望，總是希望和平；能減少一分犧牲，總是避免犧牲」。現在，日本方面已把中日問題平等解決的方案定爲國策了，只要中國接受平等條件，和平便立刻實現；試問，現在有什麼理由可以說是和平毫無希望而硬要放棄和平呢？至說犧牲，如果雙方可以實現和平，自無犧牲之可言；而不和平，却是要犧牲也沒有什麼可供犧牲了。

應戰而不戰，不應戰而戰，應和而不一，大概要等到真個逼簽城下之盟的不應和的時候才和吧！

我們對於蔣政府在「九一八」的不抵抗可以原諒，因爲還有「中國是弱國」的理由。對於「七七」抗戰也不妨予以原諒，因爲還可以勉強說是「和平已到絕望時期」。但是我們對於近衛聲明發表以來的抗而不戰陰和陽不和的盲目主張，絕對無可原諒，因爲它毫無理由可說。

日本總動員法第十一條

反證近衛聲明的真實性

王時傑

自近衛發表其調整中日兩國邦交的聲明之後，我國熱心愛國之士，莫不感覺極大的欣慰，認為和平的時機已至，欲求國家之獨立，民族之解放，不容坐失這千載一時的良機。而汪精衛先生順應大局的需要，不惜犧牲其一己的權位，毅然發表艷電，代表全國民眾渴望和平的願望，促使政府醒悟。重慶政府暨蔣先生若能慨然下最大決心，妥籌應付之策；一面利用外交手腕，善於折衝樽俎，配合着尚未崩潰的武力，力圖和平條件的更加有利，則戰爭陰霾，至今或已早日廓清，自由平等的夙願，或亦可早日實現了；何至現在還在國土日喪，人民的生命財產不斷的繼續犧牲呢？乃有別具肝膽之徒，偏說近衛聲明是日本侵略政策的一種手段——是希望避免軍事上價持遷延的損失，想把和平的烟幕，掩護其侵略的野心，完成其側面進攻，達到正面成功之目的的願望。他們一面大事宣傳，指近衛聲明為虛妄，一面壓迫國內，提出「主和即漢奸」的口號，以阻寒愛國同胞的和平呼籲。素來缺乏自信自主的重慶政府暨徘徊歧路的蔣先生在此環境之下，竟然屈服於這種野心家的淫威之下，把自己的責任輕輕地丟棄，而以國家民族的命運作孤注之一擲。其實這種別具肝膽之徒的論調，完全以它們的野心為出發點，對於日本國內的實際情形，絲毫未加考察，所以有此抹煞事實的論調。我們若將日本現在的狀況細察一下，便可明瞭日本的力量，的確很難支持長久的戰爭，其程度也正不在我國之下。日本的政治當局和有識之士正已發覺到自己的缺點，深知久戰的結果，即能獲得最後的勝利，亦將有得不償失之憾，又何況最後勝利之不一定穩操左券呢？因此他們便覺得不如直截痛快地早日言和之為愈。所以我以為近衛的聲明，倒是真誠的，不是虛偽的。現在把日本自戰事發生以來所發生的困難情形非早日實現和平不能解決的理由予以分析，藉以駁斥別具肝膽之徒那些歪曲論調的不當。但這裡篇幅有限，若將日本所遭遇的困難，一一敘述，勢所不能，茲先就其經濟方面的困難情形加以摘述吧。

日本的弱點

Eliot Janeway 著
木 軍 譯

——原文載亞細亞雜誌——

天津日本反英運動的復作，不可避免的使去年的那句舊話，即美英共同對日可致日本之死命，又被人們重新提起來了。

美國橡皮棉花物物交換的提議，在六月底還未成功之前，即陷於進退維谷之境。這一點可以說明，在那種美國可以自由行動的反軸心陣線上，英美關係真實的情形如何了。

英國對於這個提議改反響大致如下，而這種反響應視為係官方授意的。

英國謂除去目下所購買的有限的棉花以外，她並不需要更多的供給；至於小麥，假若需要的話，可向阿根廷購買。在阿根廷，英國有大利可圖，因而不容許她去幫助生產過剩

自戰事發生至近衛內閣的更替，日本的經濟政策，可以分做三個時期：第一期自「七七」至南京失陷前，日本的經濟，一面繼續着「準戰時體制」，一面講究應急的對策。第二期是從南京失陷為始，日本樹立了物資總動員計劃，簡稱為「物動」。「物動」的目標有三：(1)滿足軍需要求，(2)確保國民生活，(3)平衡國際收支。但這計劃失敗了。「技術大臣」賀屋，只曉得緊縮，竭力對輸入限制；不知因限制輸入，而使輸出遞減。輸出減少的情形，對「純第三國」(即不包括滿洲國及中國)而言，與一九三七年同期比較：一月減少二〇・二%，二月減少三一・二%，三月減少三九・三%，四月減少三八・六%，五月減少四四・六%，六月減少四八・三%，七月減少五二・五%(見去年十月一日發行的「經濟學者」二〇頁)，一月一地每况愈下的壞下去。隨着輸出的減少，購買外國軍需品的力量，也非常減少了。一九三八年七月與一九三七年七月比較，輸入力量減少四二%。然而在戰時的日本，因為本國重工業的幼稚，資源的欠缺，輸入減少，即無以饜足軍需的誅求；整個政策，遂歸於失敗。

於是第三期出現。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六日，池田上台，六月二十三日修正「物動」計劃。池田創造了所謂「個人輸出入連環制」，由「個人」的連環制，到「綜合」的連環制，一貫在獎勵輸出。為了輸出，政府運了三萬萬圓的黃金出國，備購買原料之用。

果然，一九三八年比較往年早了兩個月——七月中旬便開始出超。至十月半平均每旬出超一千七百六十八萬元。截至十月中為止，入超總數，僅僅八百十六萬，而一九三七年同期是六萬萬八千八百萬。國際借貸的改善，就入超一點看，已經減到十分之九以上了。

但是池田政策依然是失敗的！為甚麼呢？因為池田沒有把日本購買軍需的力量提高。他所獎勵輸出的市場，已經是所謂「日圓集團」的勢力。因為同一「集團」的關係，日本不能以售於「滿洲」及華北華中的莫大小(衛生衣)換取彼岸美國的發動機。試用數字來說明：一九三八年一月至九月，日本輸出總額十八億，其中輸出「日圓集團」的佔着八億。十八億扣去八億，祇有十億的力量，可買外國的軍需。而前年同期，輸出於第三國的却是十七億七千萬圓。換句話說，池田政策所得的成績是：一九三七年日本有力購買十架的美國飛機，去年只買六架便告「床頭金盡」了。

由於輸入能力的減殺，直接使那「擴充生產力」受殃。誰都知道，戰爭吞嚥大量的物資，日本必得設法去補填。而且為未雨綢繆準備對第三國開戰的所需，也要叫「生產力」來分

的美國農民。可是，美國若說要來購買其所有急需的橡皮和白鐵的話——這兩種原料，美國謂用作對抗日本向亞洲東南部擴展的保證——那麼，英國和英荷合夥的橡皮與白鐵商人，會感受到貨物脫節的威脅。

因為美國也許會決定把這急需的原料用去，而不把牠存在堆棧裏面。若美國缺乏這兩種原料，而勢必以時價購買，這對於英國財政中心，橡皮白鐵兩項貿易，是很有利的。

當然，美國真要購買更多的橡皮和白鐵，人家總歡迎她完全現錢交易。但同時，英國不能讓她假借緊急貸款的名義，以其過剩的棉麥來清付其貨價。以棉麥清付貨價當然會提高英國入口棉麥的價格。任何計劃，凡足以使美國控制大宗橡皮，其危險性，顯然較英國招引日本來攫取橡皮白鐵殖民地的危險更大。美國想以不參

担。所以戰時日本的工業構成改變了：非軍需工業縮小，軍需工業漲大起來。但是軍需工業的生產，就重工業的生產指數看，以一九三八年三月爲頂點，三月以後便下降了（即一九三七年六月爲基底，八月一〇五，十一月一四，一九三八年三月一二二，四月一八，六月一六，七月一一）。戰時最高原則的「生產力擴充」政策，黯然無光的失敗了。武漢廣州失陷後，日本政府於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日明治節，發表一個「建設東亞新秩序」宣言。板垣一流人物屢次指陳此次中日事變的特質，又發展到一個新的階級了。板垣謂：「一面戰爭，一面建設，乃是此次事變的特質」。

「建設」兩字若加以訓話，就是基於日本工業的要求，對大陸實施經濟發展的擔子。日本在華的佔領區域愈形擴大，不但兵力的分佈比例加多，經濟的担子，也累進地愈挑而愈重，因爲在支付軍費外，他們還要「建設」呀！

適應於第四期作戰的需要，最特徵的是：日本經濟的病症，變慢性了。要是借用有名的經濟學者高橋龜吉的術語，那便是：「由臨時應急的戰時經濟統制到計劃的長期建設的統制」了。「長期建設」對於日本經濟要求着什麼呢？

這是一筆不誇張的賬：

- (一) 國內擴充生產力，一年需要資金三十萬萬圓（實施資金調整法一年來投資三十萬一千萬圓。）
 - (二) 「滿洲國」五年計劃，需要資金六十萬萬圓，平均一年十二萬萬圓。
 - (三) 開發華北華中四年計劃，需要資金八十萬萬圓，每年平均二十萬萬圓。
 - (四) 財政上的赤字公債每年最少需要六十萬萬圓。
- （以上據十一月二十一日「經濟學者」）

在一個財力並不怎樣充裕的日本這種國家裏，湊集如許大量的資金，是不可能的。然而爲要「建設東亞新秩序」，非企圖湊集不可。這樣慢性的資本饑饉，就使日本經濟長期地處於二重戰爭的悲境。

本來，資本主義社會的資本，只要有利潤報酬，是無孔不入的。但依目前日本工業的發展，有些地方是靠政治的補償，給予平均利潤的。日本政府認爲迫切需要的企業，總以國防爲立場。可是從追求利潤的算盤打來，那些企業在資本家的眼中，或竟視之爲畏途。這就是：擴充生產力（主要是國防的），生產關係（私有）不肯答應。於是日本的軍人，對着

加其所接受的各種以物易物的市場，爲期七年，來消除英國的那種恐懼。就是這種保證，亦不足以誘致英國供給八萬五千噸馬來亞的橡皮，可是這個數目還不到美國橡皮消費量的百分之二十，當然不夠貯存起來，以應付兩年緊急的需要的。所以美國對於日本在亞洲東南部所施的壓力，仍是無能爲力。爲的是對付這一點，羅施福批准十萬萬美元，作爲購買戰略上所需之原料。在國會延期之前，預料將通過一個議案，每年撥二千五百萬美元，作爲亞洲設備之用，爲期共四年。

日本未來的第一號法西斯，荒木，現在顯然變得溫和了。在最近國會裏討論更進一步統治原料的時候，也許因爲是要暗中攻擊財相石渡和工商大臣八田，他拋了一顆炸彈，他說：「我懷疑：到中國事件結

日本資本主義之生產關係的夢想，就將加以「宮刑」。

那就是：發動國家總動員法第十一條。

國家總動員法，去年三月十六日通過於衆議院，三月廿四日通過於貴族院，是「授權法律」。條文本身，沒有規定着辦法手續，不過用「勅令」可以製造種種的辦法手續，已經發過七個「勅令」了。現在要全面發動，全面運用。而其中之足以引起政治糾紛，在經濟界投下巨波的，是第十一條。該條的全文如下：

「戰時，國家總動員法上遇有必要時，政府得依勅令所規定，限制或禁止：設立公司，增添資本，合併（二）企業合併）或變更目的（變更企業的目的），勸募債券，及第二回以後股份之繳納。得發處分：公司利益金（紅利），拆舊，及其他關於經理的命令。又對銀行、信託公司、保險公司、以及勅令指定的人之資本的運用（如何運用），得發必要的命令」。這樣一條冗長的條文，其實可以分拆做三項內容：（一）禁止黃金流入「不急不要」的產業部門，（二）以國家權力，干涉利潤的處分，（三）強制金融機關，投資於緊急事業。

關於（一）項的法意以及內容，大抵與「戰時資金調整法」相同。戰時資金調整法，於去年九月實施，消極限制資本投放的自由。實施一年的結果，相當防止「不急不要」的投資，即在三十萬萬的投資中，竟有百分之七八。四，投於工業及礦業。但是該法沒有積極的作用，無強制投資之權，所以一九三八年一月至八月，比較一九三七年一月至八月，計劃資本由二五〇百萬元，減為二一三二百萬元。投資的總額是低落了。

因此，第十一條（二）從積極方面，是要強制資本家投資，並且（三）投下資本所生的利潤，不許自由地分配。這不是分明對資本主義實施「宮刑」了麼？

自從第十一條成了政治的問題，日本資本家間已人心惶惶。十一月九日池田表示絕對不贊成，說着：「生在資本主義社會下，這麼一來，必定將使企業心理恐怖而畏縮」。是的，生為「男性」，「穢莫大於宮刑」呀！可是當天陸軍省情報部長佐藤民，針對着池田的話，無情地反駁道：「士兵在前方拚命，難道資本家倒可以在後方來享受利潤麼？」是的，他也「言之成理」。

經過佐藤的當頭一棒，「投資既失了自由，又無利潤的刺激」，善打算盤的資產階級，大譁又大慌。企業的股票，在交易所中，開始跌價了。九日後盤，新東（新東京交易所）一股指一元六角，鐘紡（鐘淵紡織會社）一股自高時二百九十四元，跌至一百四十一元二。此

東的時候，日本的文化是不是會要完了」。

這位將軍發表悲觀的論調，正是在他的年輕的兒輩大量的穿着國內織造襪子以代替輸入品的時候。

日本鋼鐵擴展計劃若要完成的話，在一九三九年必需輸入生鐵五百萬噸。日本自己鑛場的生產額不足二百五十萬噸。日本海軍對印度支那海岸，發生興趣，其原因就是因那兒有發展鐵鑛新泉源的可能性。可是，在日下，日本的開發鐵鑛運動是集中在菲律賓。她希望日下正在進行的談判，可以保證她在今年獲得菲律賓的鐵產二百萬噸（去年菲律賓出產的鐵給日本購去了百分之九十八）。菲律賓對日本還有一個價值，那就是她有生產量逐漸增加的錳。日本日下每年自印度購進的錳近二十萬噸（一九三一年為三十萬噸）。日本現在正

外新帝人田一二九跌至八七，日鑽由一二二跌至七一，郵船由八五跌至六一，鋼管由一一三跌至八五不等（據「改造」去年十二月號二七二頁）。日本資本主義的世界，正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時期到了。

「宮刑」，「宮刑」，果然有這樣的氣魄麼？

詳細再查究一下，知道是上當了。第十一條第二項：「限制分紅」，在德國和意大利，早已實行。德國在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公佈「公債基金法」，規定分紅不能超過百分之六，最多百分之八，多餘之額，必須繳到國家銀行，以「時價」去更換公債票。意大利於一九三四年九月五日以勅令限制工商事業的分紅，只許分配百分之六，其餘必須自行投資於公債。這種辦法，事實上是沒有得到什麼收穫的，因為德意工商業，非常凋零，超過百分之六至八的「分紅」，根本無多（據國際經濟週報——十一月十七日發行——十五頁）。

日本若限制分紅，大半也是為了財政的目的。軍部武人，一面怨尤財閥的不肯慷慨解囊，供其揮霍；一面却受着財閥金錢的支配，不能過於開罪。大概將來必定提高分紅的比率，不太傷財閥的「心」，而且根據這種限制，所受損失將是和平工業及中小工業。坂垣便這樣說了：「余對發動第十一條的意見，以為必須慢慢着，不要對各方面一下子影響太大」（讀賣新聞消息）。問題是：誰受影響最大呢？利潤率與資本有機構成的比例是相反的。——軍需工業比和平工業應用機械技術的程度較高，即有機構成較高——對投下資本而言，利潤是相當地低率的。試舉日本現在的分紅實例為證：和平工業中有四五%（帝國生命），二〇%（福島紡），而軍需工業最多也不過二〇%（日本火藥大阪製館）。同時，一流大公司，因信用充足，公積金雄厚，分紅原不多，分紅多的，大半因為資本小的關係，所以我們不能相信：軍閥對於資本主義會施以「宮刑」。

不過，整個經濟走上沉河而不治的路上來，在軍閥的「圖窮匕見」的時候，的確想藉「宮刑」以求「一時之快」的，「宮刑」的目的在求巨量的黃金，第四期戰爭所需的黃金太多，日本的統制階級呆得昏過去了。若再戰爭持久不息，則將愈見昏下去，發狂起來，有一天會把產金卵的母雞給殺死的。

但是殺死以後，日本的整個國運將怎樣呢？聰明的日本當局當然知道得很清楚的。一旦戰爭平息，則不特產金卵的母雞可不至殺死，且可日益肥碩而源源產生大量的金卵出來，則日本又何肯乎堅持與中國戰爭「到底」呢？

想控制那些尚未能控制着的鐵產。

除非美國整軍的結果，而使西岸鋼鐵工業建立起來，那時是急需菲列賓的錳和其他的鐵產，否則日本在實行其獨佔菲列賓鐵產的方案中，是遇不着什麼競爭的。

在世界大戰的時候，德國最嚴重的原料問題就是錳。最後德國從法國的銀行那裏購得了新喀利多尼（New Caledonia）的錳。上月日本在新喀利多尼亞獲得了錳鐵的產權，並正計劃建造若干提煉所，用當地原料每年生產五千噸的錳。當日本獲得這種原料的時候，法國對於這種鐵產，就無慮匱乏了。

最近聽說，克虜伯公司將在日本製提塞耳式的發動機。可是現在已將製造此項發動機的工廠移作別用了；因為製造提塞耳式發動機所必需的原料，德國方面不能交貨之故也。

上海民食問題 重耳

再就需要方面之原因而言：

(一)需要增加 自中日戰爭發生以後，上海因為租界關係，各地人民紛紛逃難來滬，迄今滬市人口已激增至五百餘萬，因此食米數量隨之劇增。最近雖因滬上生活昂貴，難於維持，有返歸鄉里者；但香港近因形勢緊張，大批寓公復轉道來滬，而寧波、溫州、福州自被封鎖後，人民避難來滬者亦不少。故滬上人口非特不見減少，且日漸增多。而食米之需要，自亦隨之加增。需要加增，若供給能相適合，尚不生問題。然需要雖漸增加，而供給反漸減少，在此種供求不相適應之狀態下，米價之上漲，乃意中事耳。

(二)操縱居奇 滬上本不乏富翁巨賈，自成爲孤島後，游資更無法運用。初因經營進出口貿易與買賣外匯，頗爲有利可圖；近因匯價低落，限制甚嚴，不易經營，故改向米糧等物之販賣。用其巨額資本，對米糧放價狂收，設法儲存；使市面上食米逐漸減少，造成人民急切之需要，俾可高抬售價，以圖厚利。雖市場有限價，然可置之不顧，於市場之外暗中交易。米價經其操縱後，遂步步飛漲；且居奇不肯吐出，於是食米價格愈漲愈高，米市恐慌亦愈不可收拾。

(三)爭購囤積 資本雄厚者，盡量購米，以操縱其價格；資本微薄家道小康者，雖無力巨量購買，亦因米爲日常生活所必需，誤信上海米糧存貨無多，價格仍欲飛漲之流言，趁此高價之時，紛紛集資向米店爭購，以俾囤積，預防匱乏；多則數十石，少則十數石不等，爭購囤積者既多，米價自無

抑低之望。於是米市在此種刺激下，恐慌之局面，永無打破之時。

(四)外匯影響 在外匯穩定之時，國米價格高漲，尙可販運洋米，以資調劑。今匯價如此緊縮，若從安南、暹羅、仰光等處運米至上海，其價每石恐亦在四五元之間。滬市米商觀此情形，乘機高抬國米價格，以與洋米價相等，此國米價格受外匯之影響者一。法幣對外匯之價格既日低落，於是持有法幣者多不願保有價值日跌之法幣，而以之換取價格步升之米穀。且囤米在手，又可隨之換取法幣，與購買外匯與金銀無異。因之食米之需要更增，其價亦益昂，此國米價格受外匯之影響者二。

有此種種原因，米價日高，恐慌日甚。富有之家，尙不受食米之影響；中產之家，已不能日食三餐白米，必以麵粉與雜糧爲佐；無產者及一班貧民，三四十元一担之白米，固無力購買；即六元六角一袋之麵粉，亦覺力不能逮。如此民不聊生，將何了局。

三 解決民食問題之澈底辦法

目前上海米市混亂之情形，與食米恐慌之嚴重，既如上述。於是各團體租界當局及滬上聞人咸以此有關上海整個民食問題，均分別或合作籌謀解決民食之辦法，報章雜誌亦不時貢獻意見。然其間所貢獻之意見與所實施之辦法，無一爲根治之道。至於今日，非特未收絲毫之成效，且愈弄而米價愈漲，甚至有錢亦無處可買。此種逾越正軌之局勢，仍在演進中，尙無恢復之望。茲先將滬上各團體所以制止米價上漲之辦法，逐一分述於次，然後再言及筆者解決民食澈底之策略，以蘇吾上海五百萬民衆所受民食嚴重壓迫之困苦。

各團體已實施限制止米價上漲之辦法，歸納言之，計有六端：

(一)勸導限價 當米市初次變動時，上海與米業有關之各團體均紛紛集議，勸導各幫客商，顧全民食，勿越限價。然而事實上各米商仍高抬米價，置若罔聞；後租界當局又規定限價，亦置之不顧，形成言之諄諄聽之藐藐之狀態。

(二)嚴禁暗盤 市場上既有限價，逾限價者即當處罰，於是各米商自不便在市場出售越限之貨色，乃將中次各米漲至限價，而頭特各米在市場外暗中交易。各團體對此認為米市紊亂中最難解決之問題，遂派人嚴密糾正，並允許人民隨時舉發，如經查明，從嚴處罰。可是暗盤仍然存在，並不因此而絕跡。

(三)嚴定罰則 上海豆米業各團體曾開聯席會議，嚴定逾限價處罰辦法，規定買賣及居間人三方各予處罰，每石各罰一元，至少須罰一百元，二次再犯倍罰之，三次則再倍罰之。除嚴厲執行處罰外，並望人民隨時舉發告密，苟無物證，而確有事實人證，一經查明，決予處罰。並規定舉發者得賞金三成。近兩月來，除巨額達路七八〇號久大米號越限受罰外，尙未聞其他。

(四)疏通來源 評價委員會曾致函工部局，大意謂欲求米價之平衡，限價與調查等，均為治標辦法。其治本之策，端賴謀求米源之豐富，若來源阻滯，而僅賴現有存米，雖嚴定限價，終難維持於不敝。處現今情形之下，欲使來源豐富，捨訂購大宗洋米外，惟有設法疏通內地來源。查蘇省米糧以無錫地方為集中點，皖省以蕪湖為集中點，今此二地，業已先後禁阻米糧運出，致引起滬市米價之上漲；租界當局據此與日方商量，均已先後開禁，而河下日有到船，車運者亦不

少。但滬上米價迄今仍未見回穩，故疏通來源，猶非根治之道。

(五)實行平糶 各米業團體除呈請租界當局設法疏通來源，並考慮平糶，建議租界當局設平糶處若干，以便平民就近糶食，每石規定價格，並限制數量，平糶虧耗，再行設法補救。最近虞洽卿等亦申函市商會，請其大宗訂購洋米，以維持民食，並低訂價格，以補助升斗之小民。此事雖已零星實現，但其加惠小民，微乎其微，故亦非治本之道。

(六)勸售麵食 租界當局鑒於米價上漲之無止境，為維持治安，顧全民食起見，經會同商定，准許兩租界內各米店附帶出售切麵、麵粉、麵包以及饅頭等四種食品，毋須另納捐照。同時米號業同業公會亦登報勸告各同業兼售麵食。此雖為租界當局顧慮民食之美意，然又為米商宣傳米糧缺乏之口實；因為米糧存底果豐，租界當局無須准許米號兼售麵食，足見米糧缺乏，於是格外高抬米價，是利未見而害已成。

各米業團體與租界當局對於制止米價之上漲，千方百計，可謂竭盡思考；可是徒然心勞力絀，鮮有成效，蓋其所設想之方法，全是治標，而不能治本，雖可救濟一時，究難安定永久，此筆者所以引為深憾者也。治本之辦法究如何乎，曰唯有結束戰爭，實現和平，恢復淪陷區域原有之政權，安定金融上正常之狀態。如此產米各地，秩序井然，農民可安心耕耘，生產必定增加；交通暢達，商人可安心販賣，運輸自臻發達。米之來源既湧，價格自然降落。銷米各地因有合法之獨立政權，不容操縱居奇；而捐稅又有一定限制，自無苛繁之弊。且幣制穩定，人心自安，無須爭購囤積。需要既合平正軌，米價必趨平衡，此種澈底辦法不僅可解決上海一地民食之恐慌，且全國民生之憔悴，亦可藉此而獲蘇也。

日蘇停戰協定與中國

楊乃匡

突然的消息：日滿蘇蒙間，已於九月十五日正式成立停戰協定了。因為是「突然」的緣故，和德蘇互不侵犯條約之訂立一樣，又叫世人大為震驚。首先表示震驚的是美國，我想，重慶當局會震驚得更厲害，而且他們在震驚之餘，又會自己對自己說：「英國無力幫助中國了，蘇俄也無意幫助中國了，但是不要緊，還有美國；抗戰呀抗戰！最後勝利必屬於我」。

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國際關係的演變雖屬幻化莫測，但亦有相當綫索可尋。當德蘇訂約驚撼世人之際，我們曾揭述其預料之中的不足為奇的理由，并對其後的日蘇關係也加以推測道：

「蘇俄如果有意與日本啓釁，則張鼓峯事件諾蒙亨事件早已擴大為正式戰爭了，何待今日？蘇俄之所以與德國訂約言好者，就是為求避免牽入戰爭旋渦，可不是現在已經證實了嗎？而且，在德蘇訂約之後，莫斯科一再放出空氣，也願意與日本訂立互助條約；雖然日本尚未表示考慮的態度，但在國際劇變後產生的阿部新內閣正在考慮一般外交關係的一點上，誰也不能斷定日蘇兩國就會開戰」（本刊第十七期第十八頁）。

「德國與蘇聯為仇，其程度不在日本對蘇聯之下；德國既能蘇聯棄仇修好，化敵為友，又有何理由強斷日蘇間的關係不會變成如德蘇一樣呢？如果蘇聯一旦表示不再干涉中日戰爭，且不再赤化東亞時，我想日本也沒有永遠與俄為仇的

黃色人種的警鐘

沈勇

上月中旬：南菲聯邦國防大臣畢羅博士發表一篇國際形勢之演說，有云：「白人在遠東之威望，現已墜於零度，苟不在太平洋恢復之，則在印度洋諸國中之威望，亦終將降前至同樣程度。……歐洲諸國現方盲目於互相仇視，而忘却白人之威望；此非任何特殊一國之威望，實為「百種」全體之威望也」云云。我讀了這段話，不勝感慨系之！

這是種族競爭的警鐘呵！

畢羅的演說是指明現在歐洲局勢之錯誤，譏諷英法德意兩集團間互相敵對之非計。言外之意，即是說英國目前在遠東所遭之命運，乃由於歐洲各國間自起糾紛之故。若歐洲局勢長此相持下去，英國在遠東之地位自不免日趨沒落；而其結果的失敗與損失，則係白人全體。畢羅的演說，在報端記載的雖祇有寥寥數語，然其用意之深長，實足令人生畏！他的立論，是完全以「白種優勝」的帝國主義來統治有色人種的傳統觀念為出發點的；所以一遇日本的打擊，馬上就意識到其他殖民地的命運；故作此警句，對「白種」人自己內部的鬭牆之爭，予以當頭棒喝。此種為種族優勝的百年大計打算的觀點，就生存競爭的法則而言，其目光之遠大，見識之卓越，的確令人敬服。不幸，在目前歐局的實際狀況，在帝國主義之間所具有的先天性的矛盾點上面，要使德意與英法兩集團，犧牲各自的本身利益為其振「白種」全體的威望而消除成見息爭言好，共同團結以對付異種民族，現在恐怕尚非其時；因為在德英雙方目前為要求自己的生命線而作戰，對於「白種」全體威望問題，覺得是緩不濟急的事，只好暫時擱置

必要了。

「假使日本表示不予蘇聯邊境以威脅時，蘇聯難道不願意同日本來一個互不侵犯條約麼？若說蘇聯與德國訂約之後，就要對日本有所作為，這實在太不明蘇聯的真實情形了。所以我敢說：蘇聯將對日正面衝突，使中國的抗戰獲得最後勝利，無異癡人說夢」（同上第二十一頁）。

我們的推測，現在已獲得相當的證明了。我們並非意存自眩，乃是為自己的國家打算，要想正告當局：冀其從綜錯複雜的國際關係中，認清趨勢，辨別環境，決定本國所應走的路。不料重慶當局至死不悟，即在日蘇簽訂停戰協定的同日，還有馮玉祥將軍在中蘇文化協會席上硬說日蘇決不會妥協的夢語。現在可是怎樣呢？

日蘇之妥協，在日本，無疑的是阿部新閣的第一件大措施。日本之所以對蘇妥協，其主要原因在於安定日本在遠東的地位；這樣，一則可以避免捲入世界戰爭的旋渦，一則可以增強對付美國的形勢；而其最終目的則在以全力解決中日問題及東亞新秩序之建設。在蘇聯，也是為了安定自己的地位，蘇聯在對東西兩大仇敵修好無慮之後，便可從容完成其第三次五年計劃，充實國力，以為將來向外發展之根本；而在目前，正好放心大胆地站在德國的旁面，不費吹灰之力，拿到東部波蘭的烏克蘭，或者還可以拿到北部的拉特維亞，以後更可以東塊西一塊繼續不斷的拿到：最合算的買賣無過於此了。我們推測下去，若果波蘭事件不能滿足德蘇的願望，中國事件不能實現日本的理想，則不久的將來，日蘇及意蘇互不侵犯條約有正式締結之可能，德義日蘇四國軍事同盟至少會熱鬧到和過去的英法蘇談判一樣。理由何在呢？簡單

•但是她們國也不至於永遠不會打算到這個問題，一旦歐洲問題能有適當的解決，則畢羅的話，自然為他們所樂聞了。到那時，英法德意「白種」人大團結而向非白種民族有所作為，不是沒有可能的。

日本過去雖然以侵略中國為能事，但是最近的表示，我覺得她是有了和畢羅所見相同的覺悟了。就拿這次事變來說罷：他開始即宣稱其目的不是在征服中國，是要改變中日兩國互相仇視態度，調整兩國的友好關係。及到提出東亞新秩序建設的口號之後，這種「種族自覺」的表示更加明顯了。所以他們的政治家主張調整中日兩國的邦交，與中國切實攜手合作，以復復東亞過去的光榮，安定東亞未來的基礎。這種思想，與孫中山先生的大亞洲主義是相合的。若中國一旦有同樣的覺悟而與日本息爭言和，進而切實的共為東亞前途——也就是為「黃種」全體前途而奮鬥，我想日本一定以至誠歡迎我們的合作，為黃色人種的世界開一新紀元。

這確是我們整個東亞及黃種人前途禍福安危所繫的問題。我認為日本的這種表示，證以畢羅的見解，更加顯示其真實性了。

反視我們中國是怎樣呢？說來傷心：國家的地位，民族的生機，近百年來給歐美帝國主義——白種人剝削壓迫得幾乎到了亡國滅種的地步，而猶明知故犯地把自己的命運，授之於異族，任其支配。自所謂全面抗戰發動以來，國際的態度——尤其是英蘇——明明以我為傀儡，作為保護其自己利益的犧牲品。兩年來，全國土地，大半成為焦土，人民財產，喪失不可勝計，而猶拚命地大鑽其牛角，已至山窮水盡，死路一條，還自欺欺人，高唱其「最後勝利」的濫調。揣其心

得很：只要與自己有利，採取戰爭與採取和平，目的是相同的啊！

日本也罷，蘇聯也罷，我們對此兩國妥協的後果，不欲妄加褒貶；可是在此一妥協之後，中國將受到何種影響，我們却不能不有所覺知：

第一，在日蘇互相妥協之下，蘇聯必須不再援助中國的抗戰，才能獲得日本的諒解。這樣，以共產黨為台柱的重慶政府，失了英國，失了蘇俄，還有什麼國際後台足以支持抗戰呢？

第二，說是還有美國嗎？日本之對蘇妥協，正是增強了對美的地位，也就是美國所以震驚的原因。在目前的國際形勢中，我們預料美國將對日退讓以減少磨擦；若說美國將因此單獨來支持中國對日抗戰，決無此理。

第三，日本的當前大事是中國問題，日本對進行此問題時最感棘手者，為英蘇美三國的對華關係，現在，英國是無力過問了，蘇聯將不肯問了，美國也不致於積極作對了；日本只要稍為她們保留餘地，便可以很順利的把中國問題做到稱心滿意的程度。

由於上述，我們感覺到日蘇妥協實在是加深了中國的危機。倘若日本竟然改變她前此中日提攜的親善政策，而以全力壓迫中國，中國惟有束手待斃，不僅無力抵抗，連想平等言和亦將有所不能了。如此，中國之亡，不是亡於日本，而是外則亡於始亂終棄的英法與蘇聯，內則亡於為共產黨藍衣社所挾持操縱的重慶政府。

我們憂懼，惶恐，唯恐中國之速亡；然而，我們又預料日本不致驟然改變初衷；假使中國乘險惡形勢尚未形成之前，從速把握着日本的國策，進行和議，國家還不致無救。

理，不啻一喪失靈性的瘋漢，他是連本身的利害都已不知打算，還談得到整個遠東的地位，全體「黃種人」的禍福的問題麼？

於是中日戰爭的和平機運，就輕輕地斷送在這種當局之手，日本所表示的和平意向，即被「不值一顧」地毫不介意的丟棄不問了。畢羅的演說，無意中把白種人的本來面目揭露於吾人之前。他告訴我們：白種人的真正願望在統治太平洋與印度洋兩區域的異種的各國，必要時，可以犧牲白種人家自己之間的鬥爭，而協力以對付非白種民族而保持全體白種人的威望。未知重慶當局聽了畢羅的話，是仍然無動於中而猶執迷不悟地繼續其專為他國利益而抗戰，自己却向同種同文的國家來鬥氣以至於自趨敗亡麼？

本來，這些話對重慶當局進言，無異於對牛彈琴，說也枉然。我不幸身為中國國民，為黃種人的一份子，對於這種不顧種族的政府，當然不能存有什麼幻想了。但是讀了畢羅的演說，更使我們不寒而慄！我們若果沒有決心與方法，把全體黃種人聯合起來團結起來以對抗白種人的侵略，則將來不但中國有亡國之禍，中華民族有滅族之慘，即全體黃種人亦恐終無噍類。我們要救國，救民族，進而挽救全體黃種人的命運，唯有記住畢羅的話：自己同種人不要盲目的互相尋仇，而忘却「黃種人」的威望，此非任何特殊一國之威望，實為「黃種」全體之威望也。

但是怎樣實現這個願望呢？我們唯有深切的希望：日本要堅決抱持中日親善，共圖東亞大計的政策；中國人民，更要充分理解中國之危機及重慶政府政策的荒謬，竭誠擁護六大全會的決議和在主席的主張，使中日和平早日實現，這樣才能救中國以至救全體黃種人。

蘇聯人口問題之危機(續)

西苓譯

五

在第二次五年計劃時期，上述的過程惟有愈見激化，並未見其和緩。例如都市人口對於總人口的百分率，在一九二六年為一七·九%至一九三三年則增至二四%，到了本年一月竟達三三·九%了。其實際數字如左(單位千人)：

總人口	都市人口	農村人口
一九二六年末	一四七·〇二七	一〇二·七二三
一九三三年一月	一六五·七四八	一二六·〇〇九
一九三九年一月	一七〇·四六六	一二四·五五七

五萬人以上的都市，從一九二六年的八五，增加到一九三九年的一七四；十萬以上的都市，從三一增加到八二。此十二年間，都市人口約增加二倍。要注意的：都市人口增加到二倍，雖在美國也要三十年，德國要四十年，法國及英國要七十年；蘇聯的都市膨脹竟如此激急，這不是一個很特異的現象嗎？因此之故，國民的生活條件便起了急變；尤其是都市住宅條件的惡化及家庭生活的紊亂等，乃成必然之勢；從而，人口增加趨勢的削減，也在意料之中了。

如前所述，一九三二年的自然增加，已經減低到對千人為一五·四人。照作者的推算，去年(一九三八)恐將不及六人。此數即較之一九三六年德國的七·二人及義大利的八·七人也退居低位，至於較之日本的一二·四一人及波蘭的一二人，則更在半數以下了。

在工業化及都市集中的另一面，多數婦女之動員於產業，實亦為惡化人口動態的原因之一。第一次五年計劃中，有二百七十萬的婦女被吸收於國民經濟的各部门。第二次五年計劃中，更是在家庭主婦中動員一百三十萬人，從各種學校畢業生及農村間動員一百七十萬人；這就是說，在第二次五年計

予欲無言集

葉紀懷

三六 中立的新聞

中國對於歐戰據說是採取中立態度的。既然中立，便該不偏不袒。但自歐戰發生以來，我們在報章所看到的消息，百分之九十含有「中國站在英法波一方面」的意味。例如在語氣上，稱德軍為「敵」，謂其進攻為「進犯」，等等。對於戰事消息，德方發出的則拚命壓制，拚命攻訐；英法方面的，不用說，大吹大擂，惟恐人之不知。最可笑者，波軍每失守一城市，不曰「因戰略關係」，即說「已取得相當代價」，與中國的抗戰新聞，一模一樣；在排字房裏，大有「舊紙板不用新澆」之效。

德波之戰，德強波弱，就人類之同情心而言，誰都同情波蘭而不會同情德國。但是同情為一事，報導消息又為一事。在本國的戰事中，揚長隱短，情猶可原；對於第三者之間的事實，決無偏袒之必要，何況是以中立自居的？

也難怪，重慶政府尚且不遵照國際公法扣留英法(交戰之一方)的砲艦，新聞記者的

劃中所增加的勞働者與勤務員，大約相當於四百萬人的百分之九十。在此期間所增加的男子勞働者中的一百數十萬人，是被軍隊吸收去了。因為勞働力的不足，故藉婦女動員來補充。

一方面擁有二百數十萬軍隊，一方面急圖擴充生產力的蘇聯，當然感覺勞力之不足了；加之在第三次五年計劃中，更有新增四百五十八萬人的勞働者與勤務員的必要；但是，這種需要的來源，除了依然求之於農村外，是別無他計的。因此，農村人口自必更趨減少，都市人口自必更趨增多，而人口的自然增加亦必更趨低下了。爲了應付這種問題，乃在第三次五年計劃中，決定把都市建設的重心，放在增強住宅建築與福利設施的一點上；又決定把全國託兒所及幼稚園的收容力，從一九三七年的一百八十萬增至一九四二年的四百二十萬。此外，並對莫斯科及列寧格勒兩大都市，禁止建設新工廠，後又把此種規定推及基輔、卡科夫、羅斯多夫、庫爾次克、斯未羅夫斯克等大都市。這不用說，也是含有緩和人口之都市集中的意味的。

一九三六年七月，曾發布以嚴禁墮胎、限制離婚、保護幼兒及獎勵多產爲內容的法令，所謂「蘇維埃家族」的新家族主義的倡導，也是始於此時。一九二四年的莫斯科的結婚數，對千人爲一四·九人，離婚數爲四·五人，皆比各國都市爲高。但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九年，結婚數約在一二·七人內，而相對的離婚數方面，則由五·六人而六人、而九、三人、而九·六人、而一〇·一人，漸漸增高起來了。其後的數字，不得而知；但就一九二九年以後的都市集中的激化而言，推想上述的傾向必益見增強，大概是不错的。當然，這對於人口動態必發生很大的影響，於是乃有上述的法令之發布。

六

就兩次的五年計劃而言，蘇聯國力之增進，那是無庸深疑的；但其在急激工業化的反面，人口問題現在都是有着很大的危機了。且就前此所發表的第三次五年計劃加以窺察，則蘇聯正在強行其使危機更趨深刻的政策。蘇聯現要強行從來的工業化政策，則無論如何，對於阻止乃至和緩人口問題的危機一點，似不可不加注意。

(完)

「情人眼裏出西施」，自亦不足爲奇了。

然而然而，却有幾種英文報紙反能說老實話，大概那些外國記者們是沒有國籍的。

三七 英法值得同情否

我同情波蘭，却不同情英法。英法的虛偽狡詐及其不道德，實較希特勒之強暴尤爲可惡。

例一，就法波兩國互助協定直到戰爭發生後（九月五日）才簽訂一點看來，英法方面對於波蘭根本沒有互助的誠意；否則，這種協定便不該成立於德蘇協定之後。可知英法之參戰，不是爲波蘭而是爲自己——不僅如此，英法正是爲自己不惜犧牲波蘭；否則，何以東戰場上一個英國兵或法國兵也沒有？西戰場又只是空喊的多！

例二，開戰起始一週，英國已犯了兩次破壞中立的罪行了：一是轟炸丹麥，一是襲擊比利時。英國飛行員的技術向來是自翊高明的，即說不高明，也不致於辨別不出何處爲陸（丹境）何處爲海，更不致於連信號的規則也不懂，竟然對着施放警告作用的閃光彈的比國飛機攻擊起來。這種國際道德及其作用也可想而知了。

但是中國報紙照例是要爲她辯護的。

書申報某日社評後

余文周

久不讀上海申報之社評，以其文筆

之古雅超乎義皇而上，而每篇涵義之廣博偉大與綜錯複雜又在在令人莫測高深，苟非翻辭源檢辭海查地圖尤須占筮卜而細細讀之，斷難領會其萬一；我輩靠賣稿吃飯的人有如許閒錢與閒時邪？所以，只好敬謝不敏而不讀之。「意者」，等到有空的時候，把它裝訂成冊，保存起來；再等閒有空的時候（或者已視茫茫而髮蒼蒼了），拿出來靜心觀摩，或者留給子孫讀讀也。

然而，却又爲了稿思枯竭之故，很想偷竊一些資源，便免不得看到上好文章而見獵心喜，而申報社評又爲上好文章之第一至上者也。「要之」，有些時候還是拿來讀讀的，而且今天的則大讀而特讀之焉。

夫「今天」者，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九月九日星期六也；其評題曰「德義蘇日四國同盟說」。其大說題，必爲大文章；爲吃飯故，鼓足神勇，絞乾腦汁，一口氣而讀之，讀罷，頭昏腦脹，待哭待笑，拍案驚奇，嘔吐大作，飯也不想吃

了，乃作書後。

其劈頭之言曰「此一消息殆將使世人震驚於歐戰之際，更受強烈之刺激歟？」一來便教我嚇了一跳，足見筆下威力非同凡比。幸而有一「歎」字，也就舒得過氣來。却又不幸得很，再讀下去，又教心驚肉跳了；何故？曰：「誠以德義日蘇各有其特殊之個性，迥殊於其他國家；……總之，皆不慊於世界現狀而各有超越本國國界之抱負者也」。你看，這「超本國國界之抱負」是何等怕人！

但是這種抱負不能發展爲事實呢？曰：「若以方式推論之，則有德國爲之橋樑，自得斡旋義日與蘇聯之間，而使四國終於沆瀣一氣」；此乃文章作法中之「起」。曰：「四國各自發展，已使世界和平到處發生裂痕（注意，這裏有侮辱蘇聯之嫌，請共產黨注意申報主筆倒戈）；四國而一氣，豈不將天翻地覆鬼哭神嚎（再注意，真的倒戈了）耶？」此乃「承」。可惜承的不大高妙，因爲末了有一個「耶」字。而且，「四國各自發展」既不好，「四國而一氣」更不好，怎樣才好

呢？並未說明，故覺不大高妙也。再看他的「轉」曰：「願以吾人觀之，決無其事」。轉得何等斬釘斷鐵！然而再讀下去：「意者，德國宣傳鑒於孤立作戰，人心容有不安，聊作「指」梅解渴之計乎？」尾巴是漏出來了，「意者」和「乎」，不啻自敲退堂鼓，關門大吉，此之謂「合」。

以上所引，是原評之第一大段。本刊限於篇幅及稿費，不容多寫；以下僅就其餘各大段中之佼佼者簡略書後之。主筆曰：「德國卒以本身迫切之需求，猝然化爲敵，與蘇聯親」，意思是德蘇之結合是可以的，因爲德國有「迫切之需求」。而義日與蘇聯呢，那是萬萬不能，因爲「蘇義之間有其扞格」，「日本則根本上與蘇聯無妥協餘地」。不過他并未把「蘇義間之扞格」及「日蘇無妥協餘地」的實際情形加以說明，又未把日義兩國決不會有「迫切之需求」的理由稍爲提示，令人莫測高深。「意者」，主筆尚兼任日本天皇及意大利皇帝之高等顧問，故能下此不必多問之斷語；否

則，普通報章之社評，決無此自成一家的獨特邏輯者也。吾人並非對於四國同盟或日蘇聯合有何成見，但覺主筆的成見却有點獨特而已。

主筆於此且「深」言之曰：「若謂兩國乃得共患難，共陣線(?)，是謂為違反「人性」之假想可也」，如此高瞻遠矚，謂日蘇或義蘇若行結合便是違反人性，真是金聖嘆的千古奇筆！特不知所謂「人格」，係三字經中之人性乎？荀子之人性乎？墨子之人性乎？柏拉圖之人性乎？康德之人性乎？甘地之人性乎？蓋人性之說至繁，有如主筆之筆毛，不知抽出那一根出來是好耳。

但是不幸得很，蘇日兩國居然出乎主筆先生的意料而結合起來了。她們誠然違反人性，可是主筆先生的人性呢？主筆曰：「任何國家俱不願意從事戰爭，而蘇聯乃為最不願意戰爭之國」。又曰：「蘇聯對於德國，由互不侵犯條約更進一步，結為軍事同盟；根據同盟，蘇德攜手作戰於歐洲」。作書後人之問曰：「究竟蘇聯願意戰爭乎？不願戰爭乎？」主筆不答。可惜我不善寫生，否則，畫一支矛，再畫一只盾，作為插圖，而且插在此處，想主筆先生見之必能為我題注曰：「矛可穿盾也，盾可

禦矛也，矛與盾并不矛盾也」。

還有兩點值得為主筆先生一說的：這位申報主筆向來是倡和陣線論的，認為德義日是一條陣線，叫做獨裁陣線；英法蘇是一條陣線，叫做民治陣線。但是他這里却說：「英法對德宣戰之後，對日已趨軟化；若蘇聯更助德戰，則英法對日必更低首下心；「日本」於是堂皇其為「英法陣線」之健者，為「民治陣線」之健者」。陣線論若果是有邏輯的，那末這位主筆先生是否定陣線論的邏輯了；若果陣線論是沒有邏輯的，那末也罷，因為他恰好揭穿陣線論的根本不成其為東西。這里敬煩陣線論者們替他備一個案。「此其一」。

再者，例來的申報社評中，一直是捧蘇聯的，但是在這篇文章中，除了開頭的對蘇侮辱之外，剛要收尾時又來了「一下」。他說：「至於蘇聯，在彼主義上政治上經濟上軍略上，凡應視為乘除得失之數量者，較他國為複雜；故其政策進退，「最難捉摸」；亦即種種作為，「種種轉變」，「最多其不同」之可能。即如目前，在歐戰之中，對於德波兩國之勝敗存亡，我人未敢斷言於蘇聯得取何政策。」這段說話，簡直是說蘇聯是一個朝秦暮楚看風使舵不擇手段不講信義

的最狡猾最陰謀的國家。這種絕對「蘇奸式」的論調，務希大小共產黨嘍囉們自行注意，以後切莫家醜外揚。「此其二」。

低頭完成，不容多說。一稿既成，又可取得幾許噉飯之資，特不及申報社評一篇十念元之優渥耳。然若非有此申報，吾又安能得此幾許噉飯之資，「若以方式推論之」，不應對申報主筆先生三鞠其躬「歎」？是為書後。

我對於申報言論的觀感與文周先生稍有不同，文周先生認申報有傾向陣線論及共產黨的嫌疑，我只覺得申報根本沒有立場。就它每天的社評而言，不僅今日之社評會與昨日之社評衝突，連在同一天的社評(即同一篇文)中也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例如上文所舉的)。以這種混亂的態度演出的報章，只有申報。申報只有混亂不清的態度，並沒有專一的立場。惟其沒有專一的立場，所以不必看重它是一樣有用的東西，雖然它是一個所謂大報。至於為文言社評的那位先生，我們知道他很清楚。好在他的文章根本看不出道理來，加上他那自以為是的之乎也者只有令人發嘔，也就用不着我們多指摘了。文周先生以為然否？

抗 議 旬 刊 第 十 八 期
二 十 八 年 九 月 廿 一 日 出 版
編 輯 人 江 鎮 南
發 行 人 狄 淵 坊
經 售 處 各 書 坊
定 價 五 分